

艾德豐斯·布蘭史泰特一九二四年北京信件：關於設立天主教大學於北京之計劃
 The 1924 Peking Letters of 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regarding Plans to
 Establish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作者

康士林 (Nicholas Koss, O.S.B.)

天主教輔仁大學

譯者：張 琰

天主教輔仁大學是由美國聖文生修院的本篤會修士應梵諦崗之請在二零年代中期於北平創立，當時修院總院長為司泰萊 (Archabbot Aurelius Stehle, O.S.B., 1877-1930)。去年，天主教美國傳媒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出版了一本聖文生修道院院史，書名是《傳教到美國：美國第一座本篤會修院聖文生總會院院史》 (Mission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The Firs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書中第六章〈中國任務 (1918-1930)〉敘述天主教輔仁大學的創立，第七章〈挫折與審判〉則描述本篤會士在一九三三年迫不得已將這所大學交給聖言會的情況。

一九二四年，司泰萊總院長指派五十四歲的聖文生總會院前副院長艾德豐斯·布蘭斯泰 (Fr. 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前往北京考察設立大學事宜。艾德豐斯與另一位本篤會士普拉西度·拉騰柏格 (Fr. Placidus Rattenberger, O.S.B.) 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八日抵達北京，立刻展開確定創設一所天主教大學可能性的重要工作。不久，艾德豐斯就開始寫信回聖文生。這些信當中有許多是寄給斯泰萊總院長，一方面告訴他北京的情況，一方面也請他指示該如何進行。艾德豐斯平均每兩個星期寫一封信回聖文生總會院。聖文生總會院的檔案室收藏了艾德豐斯在一九二四年寫的九封信。

這些信件主要是寫給聖文生總會院院長司泰萊的。Mission to America 一書中詳盡的敘述了司泰萊擔任總院長的任期中種種，以及掌理輔仁大學創校事宜的角色。在艾德豐斯信件檔案中，也有五封司泰萊總院長在一九二四年間寫給艾德豐斯的五封信的副本。司泰萊總院長的這些信只供參照，用來幫助我們了解艾德豐斯信件的內容。司泰萊總院長許多和輔仁大學有關的信件，仍待詳細的研究。司泰萊總院長和艾德豐斯兩人關係中一項有趣的因素是，年輕的司泰萊修士在擔任林安德總院長 (Archabbot Leander) 的副院長時是艾德豐斯的屬下。而當司泰萊在一九一八年選上「助理總院長」以後，反而成爲長他七歲的艾德豐斯的上級。

艾德豐斯在一九二四年中寫的其他信函，有寫給聖文生總會院副院長、寫給本篤會同修、寫給聖查威爾慈善修女學院 (Mercy Sisters of St. Xavier Academy) 以及奧圖爾神父 (Fr. Barry O'Toole)。本篤會院的副院長 (the prior) 是由會院院長指派，負責協助院長管理會院。聖查威爾學院是一所私立天主教女子高中，由「匹茲堡慈善修女會」管理，距離聖文生總會院很近。奧圖爾神父是一位主教區神父，在聖文生總會院教書，在一次北京之行途中，他首度向美國本篤會提議在

該地經營學校的可能性。不久後他就被任命為北京這所天主教大學的第一任校督，而這時候他正完成在美國寫的一本書。

在司泰萊總院長於一九二五年二月造訪北京之前，艾德豐斯一九二四年的這些信已經提供他許多關於在北京設立天主教大學的事情。因此本人將在本篇論文中研究這些信件，了解這方面的內容，尤其關於以下問題：是否應該先設立一所學院（即高中）、學生從何而來、教授課程、學校地點、資金的籌措，以及中國天主教教友的角色。這些信件中也有些關於中國天主教會和中國政局的評論，以及對於身為本篤會士的艾德豐斯以五十四歲高齡被派往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中工作，如何處理週遭情況的評論。不過這些內容將是另一篇研究的題材。

在聖文生檔案中，艾德豐斯寫的信並未包含所有他從北京寫的信件，這一點，從現存信件中提及的某些信不在檔案中就可以看出。例如艾德豐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的信中提到他在八月一日寫的信，該封信就不在檔案中。而後，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一封司泰萊總院長寫給艾德豐斯的信裡，也提到艾德豐斯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九日寫的一封信，不過這封信也不在檔案中。

從北京寄信到聖文生總會院，通常需時一個月或六星期。司泰萊總院長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的信中提到艾德豐斯七月三十一日的信在九月十六日才寄到。之後，聖文生的副院長也會在艾德豐斯寄來的信上寫下收信日期。因此，在艾德豐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的信上，就有「二五年十一月六日閱」的註記。毋庸待言，信件往返所需的時間不時會為偶而需要總院長即刻答覆的艾德豐斯造成問題。於是在有些情況下，會以電報加速聯繫。在艾德豐斯的信件檔案裡也保存了一些這類的電報。最後，我們應該記住，艾德豐斯的第一語言是德語而不是英語。聖文生總會院在一八四六年創設於巴伐利亞。司泰萊總院長是首位非出生於德國的總院長。艾德豐斯有些信是用德文寫的，尤其是寫給他同修的信，不過他大多數的信件是以英文寫就。

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位神父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八日星期二抵達北京。七月十七日，兩人合寫了一封信給司泰萊總院長。這封信「簡短的說明普遍的狀況，以及權威人士對於我們事業的印象」。這項「事業」是設立一所天主教大學。「權威人士」是一九二三年抵達北京的中國第一位宗座代表剛恆毅（Archbishop Celso Constantini）、華北退休的宗座待牧夏林主教（Stanislaus F. Jarlin, C.M.），以及下林主教的助理主教法卜禮主教（Bishop Fabrique）。

這次會面他們是以拉丁文和法國籍的神職人員交談。從之後艾德豐斯的信上（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可以知道：「...這些人（北塘的法籍傳教士）當中無一能說英文...而後我們很快也注意到西塞羅的風格並不時興，而英格曼（拉丁文法書的作者）的規則也多被違犯，但是並無大礙，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有些神父、事實上是大多數這些神父，拉丁文都說得十分流利。」與剛恆毅主教面談時或許也是使用拉丁文，因為日後艾德豐斯成為這位主教的英語會話老師。

七月十七日的信尾提到，「宗座代表切盼本篤會士接受這項殊榮以及厚愛（在北京創立一所天主教大學）」，由此可見艾德豐斯與普拉西度兩位會士的北京行屬

於探測性質。顯然在這一點上，本篤會士尚未有定論。因此這封信是第一份給總院長的現場報告，提供總院長及聖文生會院會議作最後決定的資料。

這封信的第二段描述他們初次與剛恆毅主教「會面」的情形。根據隨後的一封信（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該次會面是在七月九日星期三。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人寫道：宗座代表「強調這件任務的艱難及重要。他也強調我們一切行事都必須懷有慈悲和和睦。」兩位本篤會士接著以一種類似旁白的語氣寫道，「這項勸告的重要性」在他們以後拜訪主教們和其他人時可以看得出。在首次拜訪剛恆毅主教的描述末尾，他們寫道：「他尤其一再交代我們要經常請教主教、接受建議、不要答應任何事，在深思熟慮後才作出結論。」

第二段的內容間接呈現了兩位本篤會士到達中國時非常複雜的教會情況。本篤會是羅馬天主教會結構中一支不具義務的宗教教派。因此，他們一般會應主教之請在主教區內運作，不過他們做的事卻不是由主教所決定，只有在進行教區活動時需要主教的允許。本篤會會院院長都嚴格遵守這種狀況，但是，不具義務的教派和主教都要聽命於教宗。聖文生總會院的本篤會士之所以來到中國，是奉了教宗之命，而教宗顯然是回應中國天主教文人的請願。夏林主教並沒有要求本篤會士到北京，不過他一定也深知這是教宗的「希望」。因此，當剛恆毅主教告訴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我們一切行事都必須懷有慈悲和和睦」時，他針對的就是這種複雜的教會情況。

■ 先成立學院（即高中）

在七月十七日信上第三段，艾德豐斯與普拉西度二人描述了他們初次與「主教」會面的情形。由於夏林主教已經退休，我認為此處的「主教」，係指助理主教法卜禮。

主教以強烈的語氣提到我們文件中提及的「大學」。他再次表示反對設立學院（高中），但是願意開設兩年的大學預備課程。他稱這種預備課程為「大學預科主要課程」。而他反對僅只設立學院（高中）的理由如下：一、北京已有學院；二、僅僅（原文有誤，以鉛筆改正）一所學院，無法吸引中國學生；三、羅馬文件要求設立一所大學。

隨這段文字產生一個有爭議性的問題，與在北京設立天主教大學有關，這個問題在艾德豐斯神父以後的信件中也經常討論到，那就是：本篤會士能不能在設立大學之前先成立一所「學院」？在這封信及其後信件中，「學院」的意義指的是美國人所稱的「高中」。在強調要設立一所大學而不是學院之際，主教沒有提及但是艾德豐斯在頗後面的一封信裡說到的一件事，就是主教本身正籌畫這麼一所學校。不過主教當然有權利在他的轄區中設立他想要的學校。

我至今尚未找到艾德豐斯離開聖文生之前接受何等指示的相關紀錄，不過在他描述他們與剛恆毅主教初次見面情形的七月二十日的信件中，倒是暗示了他接受的指示是先設立學院（高中）：「自然討論了我們來此的目的，當他（剛恆毅主教）只提到教廷要求我們創立一所大學時，我們心中不免起了一些疑慮，因為我們的理想頂多是建立一所學院。」我們也應該記住一點，美國本篤會士這時候並沒有經營任何大學，只有高中和學院。此外，聖文生率先開始而美國加西尼聯會其他修院繼續下去的傳統是，先設立高中，再成立學院，此處學院指的是四年的高級文科課程。聖文生在這時候除了一所學院和神學院外，還有一所高中，教授發願要成為本篤會士的學生及一般「俗世」學生。

想要從學院開始，除了是美國本篤會士設立學校的通常方式外，另一個理由是，學院也可以用來作為本篤會士人選的訓練之用，聖文生就是這樣做，讓普通學生和本篤會士人選一起上課。因此，七月十七日信第四段是這麼開始的：「在七月十四日一次面談中，艾德豐斯神父直接詢問宗座代表，可不可以為可能成為神職人選的男孩或青年開設學科課程。」從隨後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艾德豐斯對這一點的興趣來自他知道一件事，即本篤會士要終能成功的經營一所大學，就必須有中國籍的本篤會士協助經營。

第五段清楚地顯示剛恆毅主教了解艾德豐斯所說的需要修院的話，不過他也明白，建立一所修院的許可權是在主教手裡：

根據宗座代表所說，我們的工作是雙重的：成立一所有宗教訓練學校的修院，以及成立一座大學。羅馬已經賦予我們成立大學的權利，但是若要設立一所修院和會士人選的訓練學校，就需要一份呈主教的書面請願書。此事我們認為最好交由您決定。

然而在這封信結尾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對宗座代表來說，大學的重要性在先。「根據宗座代表所說，我們主要的目的是成立一所大學，其他事情都是附帶的。」

艾德豐斯隨後的幾封信也都提到本篤會士應不應該先設學校的問題。七月十七日寄給司泰萊總院長的信中，這個問題還顯得相當理論性，但是在現存的下一封艾德豐斯寫給司泰萊總院長的信中，也就是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的信，就出現了將一所北京的學院轉交給本篤會士的可能性：

前幾天愛爾蘭（拉薩路）神父之一來看我們，而在我們長時間的談話中告訴我們，他們一直在經營的這所類似高中的學校即將關閉（原文有誤）...他也提到，被要求繼續經營這學校的修士們如果知道現況，將不會答應，因此根據他的看法，事情很自然的發展就是主教會把學校給我們經營，這就相當於讓我們建造一所學院。...他相信現在主持該校的學者們將會是良好的核心份子，可有進一步的發展，他本人雖然要前往愛爾蘭，但是也願意在必要情況下等待一或兩年。他深信這樣的安排會有

很好的結果。而我們的人員也可以在同時投注時間和精力在此地語文的學習上。在我看來，這個計劃十分理想，不過有不少地方還需要調查之後我才能提出完整的報告。這項調查將會逐漸開始進行，並通報您。

同一封信上還說，主教現在在暗示，「如果我們（本篤會士）還沒有準備立刻成立大學的話」，他或許可以准許開設「二至三年的預備課程」。(2)

這項消息來源的愛爾蘭神父可能是穆倫神父（Fr. Mullen）。他首次被提及，是在七月二十日信中，在後來一封信中他正計劃返回愛爾蘭。上述引述也顯示，設立一所學院，除了要訓練本篤會士的人選之外，另一個理由是可以成為大學的學生來源。第三個原因是可以給美國本篤會士一個機會，在開始經營一所大學前學習中文。艾德豐斯神父對於這麼一所學校的熱切，道理非常明白。

然而，不到兩個月之後，本篤會士成立學院的另一項可能性也發展出來。艾德豐斯在十月八日寫給聖查威爾慈善修女會的信中寫道：

...我們有一個絕佳的機會，就是開封的學校，開封的主教希望我們掌管。我和我的同修（普拉西度神父）認為這是建立自己並且確保未來大學成功的絕佳機會。我們急切的等候總院長首肯的消息。我的同修（原文有誤）現在甚至都在該所學校授課了，而我大隱在這座人口稠密的北京市，觀察事情的進展。

在這封信中，艾德豐斯似乎完全贊成接手這所名為「佩文天主教學院」的學校，並且也認為司泰萊總院長會同意。本篤會士如何和這所學校接觸，在 *Mission to America* (289-90) 一書中有說明。

寫信給修女會後不久，艾德豐斯本人前往開封，並在十月十六日發電報給司泰萊總院長：

即刻接收開封學校對北京事業之成功至為重要...回電開封天主教會。

司泰萊總院長在回電中指示艾德豐斯與普拉西度返回北京。他並且宣佈他也將前往北京。

在十月十八日的一封長信上，司泰萊總院長說明本篤會士何以不能在這時候接掌開封那所學校的原因，不過他不排除未來接掌的可能性。他更進一步說羅馬現在給他們五年時間準備成立大學，而耶穌會則花了七年時間在東京成立索非亞大學。

這封信當然費了一些時間才寄到艾德豐斯手上，而後者已經認定接下這所學校是正確的事。十月二十一日他再度去電司泰萊總院長：

...開封的學校必須立刻接受，否則機會稍縱即逝，因為絕佳的地點...

may be purchased ratione belli gubernium indiget peccuniis kaifeng only
logical place for permanent monastic establishment therefrom develop
pending foundation

司泰萊總院長立刻回信：

如果我們做出任何可能妨礙羅馬交代之工作—亦即北京建立大學—的事情，顯然即使不費分文，我們也不能接受一塊地。要有耐心，服從！

對司泰萊總院長而言，在這時候接下這所學校，根本不可能，因為羅馬並沒有要本篤會士們做這件事。

軍閥使得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人無法如原計劃立刻返回北京。十一月一日艾德豐斯寫了一封詳盡的信給司泰萊總院長，談到接受佩文天主教學院，並且提出理由：

至於立刻開始教導大學中一些教職員的事，我在此僅只加上這麼一項考慮：我們會晤過 American indemnity college 的校長、兩所位在天津（原文有誤）的大學（原文有誤）校長，還有管理一所大學的耶穌會神父們，以及許多神職人員，有歐洲人也有中國人，而這些人都是在中國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這些人一致認為，如果沒有某種學生來源的「供應者」，又沒有先從成功管理一所低階學校獲得良好名聲，要設立大學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了好名聲，我們也最好記住，教任何學校的教授都必須知曉當地語言，即使不是全體教授，至少負責學科的老師要是，而這些人也不能是中國人，除非他們是我們教區的一員。任何相反的方法將不只招惹、甚至還會產生最嚴重的問題，也會使我們受到全國的嘲諷。
...我們不是應該立刻把握這絕佳提議，使我們先在開封立足，待時間和時機成熟，再立足北京，開始著手大學之事嗎？此地有經驗的教師負責下，我們的人員可以獲得管理學校所需的語言及經驗。此地我們可以享有最佳機會，得到初期學習教士及教友的可能人選。而在北京教區我們就沒有類似的機會... (1-2)

根據艾德豐斯的看法，本篤會士如果想在北創一所大學，就必須先建一所學院作為學生來源的「供應者」。其次，美國本篤會士如果想要經營一所大學，必須先有經營大學的經驗。第三，這可以給美國本篤會士一個學習語文的機會。最後，這所學校還可以幫助募集本篤會士的可能人選。

不過，身為一個謹守本分的會士，艾德豐斯對這項爭論提出他的看法之後，在信的結尾這麼寫道：

請總院長放心，我們會盡力完成您的願望，接受理性和祈禱與苦修產生的清明忠告的引導。一俟可行，我們即將返回北京，租妥房舍，恭候您的到來，希望您將在不久後抵達。(2)

這封給司泰萊總院長的信，當然是到十二月初才寄到。

在十一月七日寄給艾德豐斯的信上，司泰萊總院長明白表示大學必須先設立：“Roma locuta, causa finita”(2)。而到這時候，艾德豐斯應該也清楚總院長會遵照羅馬的命令。

然而，司泰萊總院長這封信尚未寄到，艾德豐斯就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再度去信院長，說出他對這件事的看法：

這封信會很簡短，我只請問一個問題。我本想當面與您談這個問題，但是因為目前政局不穩，您無法前來，因此我最好現在請教您。您對北京這所大學的未來有何願景？您希望招收中國男孩，教育他們日後為教會服務嗎？或者您希望教授全由海外（原文有誤）派來？如果是前者，那麼我們建議接收開封此地佩文中學不是很有用嗎？不然有什麼反對的理由？

艾德豐斯很清楚，除非訓練出中國籍的本篤會士，否則聖文生總會院和美國加西尼聯會就必須提供在北京這所大學教書的所有人員，而他必然認為聖文生和加西尼聯會都不會接受這項提議。

十二月七日司泰萊總院長回覆艾德豐斯十一月一日的信，這封信上他舉出該接受開封學校的種種理由。司泰萊總院長說明他的立場，極力強調羅馬才是最終的決定者，而事情或許會有其他可能：

我永遠也忘不了塔可米主教堅持要求「是」的答覆時的滿滿信心，事實上它是完全拒絕「否」的答覆。

隨信附上的小冊說明了我們對於北京基礎的立場。我們不可以危及它的成功。不論接納開封的提議合不合適，也必須由羅馬先我們決定。至於訓練我們人員等的問題，我們當然可以利用開封這個機會...但是穆倫神父說要給我們的在北京的學校怎樣？此外，你確定「在北京教區我們就沒有類似的機會」嗎？那北京附近呢？

收到這封信以前，艾德豐斯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同修，此人先前曾經寫信給他。（這封信開頭稱謂只寫「我親愛的同修弟兄」，我尚未查出此人是誰）艾德豐斯在信裡說明他發現他和總院長之間產生了重大的誤會：

事實上，總院長信上最後的話簡直讓我氣結。如果我在一艘船上，聽到他說用開封這裡的學校作為大學的「替換」，我一定會栽到海底。我們

從沒有說要找大學的替代物，只是相信在既有的條件下，我們應該先在這裡成立一所學院，或者就接收這所學校，將它發展成學院，使它可能招收本地男孩，訓練他們成為老師和教授和神父。依我的想法，這樣一所學校是絕對必要的，否則我們要怎樣找到人選，訓練他們進教會？大學幾年內還不可能開課，但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立刻忙碌起來，而這所學校不但不會妨礙大學，反而會使大學有更穩固的基礎，因為接受訓練的男孩當中一定有一些會繼續進修學業。若是這裡沒有為想成為本篤會士和神父的男孩設立的學院或是訓練學校，我無法想像（原文有誤）未來這裡會有教區。但是由於這樣的人會很少，尤其是開始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先收外界人士若干，就像在聖文生那樣。有了大型的建築（原文有誤），會有數以百計的男孩前來申請，除非現在宣傳的仇視外國人和外國學校的行動雷厲風行起來，又爆發目前在各地倡議的革命。但是這是一種極端的情況，況且沒有一個人能夠預見隨局勢演變的情況。我們不能太在意那些可能永遠也不會成真的不安。（1-2）

讓艾德豐斯如此氣憤的「替代物」一詞出現在總院長十一月七日的信中。總院長在這封信中詳述他前往北京和羅馬之行的計劃並且說明他對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人的期望：

...我仰賴你和普拉西度神父盡可能進行教廷交代我們的工作。除非我們發現這件任務不只是困難，更是確確實實的不可能，那時候我們才可以要求替換成一個在我們看來比較可能而且顯然也比較容易成功的任務。

總院長似乎只是比艾德豐斯早一步擬定應變的計劃，但是艾德豐斯卻沒有察覺。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總院長抵達北京之前，艾德豐斯已經讓總院長所有的信都關注在先設立學院或是大學的問題上了。在總院長這次的來訪期間，回絕開封主教提議的決定將會確定，在北京建大學和修院的計劃也將開始進行。不過，在這種背景下，本篤會士於一九三三年離開輔仁大學時，希望留在中國的會士們—包括艾德豐斯—會決定前往開封，這一點就不足為奇了。

天主教大學的學生

艾德豐斯主張要先設立學院的一個理由是，它可以作為大學設立後學生來源的「供應者」。一九二四年的信件中有更多關於這個問題的資料。在給司泰萊總院長的第一封信（七月十七日）中，我推斷是法卜禮主教的一個人所提出主張先設大學而非學院的理由中的第二點是：「僅只（原文有誤，以鉛筆更正）是學院，無法吸引中國學生。」信的後文也說，總主教和主教都肯定學生會申請進入

這所大學，「只要大學能提供良好的學科和齊全的課程」(2) 此外，他們也猜測學生中會有基督徒和「異教徒」。

而後，在七月十九日寄給聖文生副院長的信中，艾德豐斯對這個問題提出更詳盡的分析：

針對最初會申請進入這所大學的學生數目，各方意見分歧，主教和他的神父們預期十分樂觀，而熟知教育事務的穆倫神父卻表達他的疑慮，不過他說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大略的估計，就是詢問此地重要的天主教學院，問他們能派給我們多少學生。我們很快就可以拋開這種探測方法。各方都同意一點，那就是這所大學的標準要設得高，即使不能高過這一區現有的五、六所大學，至少也要相同。只有優秀才能成功。(2-3)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出來，穆倫神父對於艾德豐斯意見的形成似乎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力。不過最有趣的是，各方面都一致同意，這所天主教大學必須是「即使不能高過這一區現有的五、六所大學，至少也要相同」。從這段文字可以知道，本篤會士一開始就有將這所天主教大學辦成一流學校的目標。但是在這同一封信上也可以看出，艾德豐斯對於其他大學的品質不抱幻想：

我不妨在此一提，許多學校現今的標準相當低，學生對於進入大學的準備並不充分。(3)

到了十一月一日，艾德豐斯對於新大學招生問題已經變得沒那麼有把握了。他寫信給司泰萊總院長：

至於可能申請進入我們大學的學生數目，只有宗座代表抱持樂觀的看法。法卜禮主教甚至一度說，我們寧願出錢給學生來上學，也不要他們出錢。(2)

主教這句話很驚人，因為它似乎反映出雷鳴遠神父 (Fr. Vincent Lebbe) 曾經說過的事：華北的法國籍傳教士在夏林主教領導下付錢給中國人去信基督教 (Levaux 99-104)。艾德豐斯可能沒有察覺這話的諷刺意味。不過，在司泰萊總院長前往北京之前，令艾德豐斯大為擔憂的第二個問題是，這所新的天主教大學學生要從哪裡來？

新大學的性質

根據學生願意到有良好課程的大學就讀的理由，這些信件所述新大學計劃授

課的內容倒是值得一看。七月十七日的信件提到這所大學的性質，信上指出剛恆毅總主教

堅持大學裡要包括神學和哲學課程。主教的建議是先從他所謂的「大學預科主要課程」開始，並且加上下列科目中任選一科：哲學、中文與英文、歷史。

剛恆毅總主教希望這所大學裡也設神學課程，這或許和主教在北京管理大神學院遇到的問題有關。在八月二十日寫給司泰萊總院長的信中，艾德豐斯描述了大神學院的校監來訪的情形。在那次拜訪中，校監要求本篤會士前去授課，可能是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讓神學院學生獲得學位。艾德豐斯的信中對這個話題不再提起，因此司泰萊總院長一定很早就回絕了這種提議。因為羅馬交派聖文生總會院的任務是成立一所大學，而不是神學院。

我們在前面也提過，艾德豐斯對於中國大學生的水準有疑問。他關切的是不要讓這所天主教大學也步上後塵。在七月十九日寫給副院長的信中，艾德豐斯寫道：

若是我們在僅只是學院的建築上升起大學的旗幟，這必然是件莽撞的事。這樣的行為會招致此地教會當局的反感，羅馬方面反應更甚。(3)

這種對質的堅持，是與設立這所天主教大學有關人員行事的特點。

艾德豐斯考慮的另一件事是授課使用的語言。他偏向於使用英語：

至於語言，英語在這片土地上日益成為商用語文，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一點在法國人看來是頗為遺憾的，因此希望他們會全新全意的合作，自然是絕無可能。不過透過英文（原文有誤）這種知識可以得到的好處，會引導青年進入一所以英文作為講課語言的學校。(七月十九日信：3)

這樣的政策也使得美國本篤會士甫抵中國後就可以授課。不過，到了十一月一日，在寫給總院長的信上，艾德豐斯也相信日後前來教書的某些本篤會士必須也要通曉中文才行。

...我們最好記住，教任何學校的教授都必須知曉當地語言，即使不是全體教授，至少負責學科的老師要是，而這些人也不能是中國人，除非他們是我們教區的一員。任何相反的方法將不只招惹、甚至還會產生最嚴重的問題，也會使我們受到全國的嘲諷。(1)

艾德豐斯會作出這所大學不應該由中國人負責學科工作，除非他們是本篤會士的

結論，是一件有趣的事。他似乎強烈的認為這是一件本篤會的任務。

不過，一般來說，艾德豐斯在他的信上並沒有對大學的性質多作思考。這或許是因為司泰萊總院長在八月十五日寄給他的信上說：「不要先提出課程大要，但待奧圖爾博士抵達。」艾德豐斯是在奧圖爾神父抵達北京後才開始計劃這方面的事。奧圖爾神父和司泰萊總院長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到達。

大學地點

著手許多事情之前，必須先作出一項基本的決定，就是為天主教大學擇定一個適當的地點。由於這所大學將由本篤會經營，所以還有一個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修院應不應該和大學在同一個地方。傳統上，凡是本篤會修院經營的學校，都是和修院在同一塊地上。但是修院通常都需要有大片土地，因此另一項重要考慮就是土地的費用。

在七月十七日的信上，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人寫道：

提供意見的各方都同意，只要成立大學這件事決定了，就應該立刻購買土地。原因是不要多久市內和市外房地產價格都會有上揚的趨勢，此外，他們也都表達了對工資也會上漲的憂懼。

各方面都要求本篤會士在這方面動作加快。不過從七月二十日寄給奧圖爾神父的信上卻可以明白看出，聖文生會院會議對於在北京建大學仍然沒有定論，因為艾德豐斯提到，奧圖爾神父現在應該比會院會議先知道關於北京的提議。因此現在無法考慮立刻購買土地。接著，艾德豐斯繼續寫道：

（在會院會議決定之前）這段期間，我們兩人將會尋覓一處適合學校所在的地點，當然目前我們不會採取確切的行動。我們會前去尋找兩處地點，一是在城裡或近郊，一是在鄉下，後者可以購買較多土地，我們或許可以擁有農場的好處和方便。

傳統上美國本篤會修院也都有廣闊的農場，因此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位神父也道北京市外尋找可能地點，這就不令人吃驚了。這番話暗示艾德豐斯建議讓大學和修院位在同一地點。此外，艾德豐斯深知未來必須與奧圖爾神父密切合作，所以在這封信上還向他請教關於地點的意見。

司泰萊總院長八月十五日的信上強調配合宗座代表選擇校地的重要性，也指出修院最好是在單獨的地方：「遵從代表所選的地點，但是請考慮修院建在他處的合理性。」九月十七日，總院長勸告暫不選擇地點，除非代表堅持。關於校地的最後決定，是在司泰萊總院長北京之行中和總主教協商後達成，這塊地離大教

堂不遠，將容大學和修院兩個地方。

財源

購買校地就會帶來籌措財源的問題。頭一次提到籌款是在七月十七日信近結尾處，信上說：

他（剛恆毅總主教）也說建造修院的費用必須由我們自己籌措。至於設立大學，他答應傳信部會有必要的協助。

從這番話中可以明白看出，和修院設立有關的費用，聖文生都必須支付，但是如果修院和大學在同一個地方，這塊地的費用由誰支付，就沒有那麼明白了。要說可以仰仗羅馬什麼地方，「必要的協助」也太含糊。

為這所新大學籌措費用並不是艾德豐斯的直接責任，而是司泰萊總院長的，後者也花費許多時間考慮可能的籌款安排。在八月十五的信上，他告訴艾德豐斯：「如果傳信部會為新大學的建築出錢，他們也會為校地出錢。」因此，司泰萊總院長這時候是希望獲得傳信部的實質支持，但是從事情的後續發展可以看出，司泰萊總院長很快就發現，自己成為為一所天主教大學的創設和經營籌措款項的主要人物。

總院長必然很清楚，這項計劃太過龐大，本篤會士無法獨力籌款。艾德豐斯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信上首次提到「庚子賠款委員會」。庚子賠款的錢透過美國幫助清華及其他國立大學的創立。到一九二二年，「有些（庚子賠款基金）收入似乎會捐贈教會機構組織」（Lutz 233）。司泰萊總院長必定指示艾德豐斯與庚子賠款委員會接觸，因為艾德豐斯寫道：

過去幾天我本想寄上聖誕節的問候，原本希望能順便向您報告與庚子賠款委員會會面的情形，然而因為消息缺乏，也許一時間還不能會面，我也不能再延誤...

而後在十二月，艾德豐斯寫給聖文生副院長的信中解釋道：

寄上上海報紙關於庚子賠款委員會處理基金的簡報若干。由於這些文字描述得相當清楚，我就不再加上任何說明。請將一份簡報交給總院長，並致上我們的祝福與問候...

司泰萊總院長用盡一切方法為這所大學籌措費用。而艾德豐斯也決意要作到總院長要求他的全部事情。這一點可以從他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信中看出。信中艾德豐

斯描述軍閥之間的戰爭使他無法從開封回到北京的情形：

然而鄉下到處都會有土匪，因為從軍隊退下來的軍人和被免職的將軍及省長的手下，會充斥在各處。即使現在那些搶劫的報導也越來越嚇人。
(2)

不過他又加上一句：

只要我們有關於與庚子賠款委員會見面的確定消息，這些（原文有誤）都不會阻止我回北京的心。

在尋求對大學的財務支持時，就連土匪強盜也阻止不了。

艾德豐斯在信上提到籌措大學費用的最後一個可能來源是英博士。我們不清楚他是自己主動要調查這種可能性，或是應司泰萊總院長之請。不過從他在十一月十八日信中所寫的內容可以看出，要從英博士那裡獲得財務支援，希望並不大：

我們不能指望從英先生處得到財力支援，因為他沒有什麼錢，從他妻子過世還要穆（Mu）先生支助喪葬費用就可以看出，不過作為教授，他倒是能有珍貴的協助。

因此在司泰萊總院長抵達北京以前，從中國境內籌措這所大學的費用，並沒有清楚的前景，只有羅馬或許能提供協助的可能性。

中國天主教友的角色

艾德豐斯在一九二四年所寫的信中經常提到宗座代表、主教、穆倫神父和其他人給予的建議，然而對於首先倡議在北京創立一所天主教大學的英博士和其他中國籍教友，他提到的並不多。不過艾德豐斯在七月二十日的信上倒是有向奧圖爾神父提到，他們到達北京時，穆和英兩位先生在車站迎接他們。他進一步向奧圖爾神父解釋：「我們和穆及英兩位先生商議數次，他們已經安排好學中文之事，明天中文老師就要來上第一堂課。」

在八月二十日給司泰萊總院長的信上，艾德豐斯提到到穆先生家裡去玩。但是在收到這封信之前司泰萊總院長在九月十七日的信上力勸艾德豐斯「去培養與穆、英及其他中國人的友誼」。到十月十八日，司泰萊總院長眼看艾德豐斯仍然沒有告知多少關於英與穆兩人的消息，於是他在信中表達了不悅：「你對於與我們真正老朋友－英博士和穆博士－會面的事情隻字未提，你是不是其實根本沒有見過他們？」

艾德豐斯在十一月一日信中回覆司泰萊總院長九月十七日的信，並且說明了和英博士及其他中國人的關係：

我們正在培養與我們熟識的中國人的友誼，但是容我在此聲明，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出這種友誼所產生的任何具體好處。相反的，若是我們甫進到這片迷信充斥之地時不被這些人的勸告牽著走，我們的語言知識會更深入。尤其是和他們會面之時，因為那要花費太多時間去詳細解釋，還有可能產生誤會。(1)

不幸，艾德豐斯在這時候卻不能和鼓吹創立天主教大學的中國人發展正面關係，甚至可能連與一般的中國人都不能友善交往。諷刺的是，他似乎和北京的法國傳教士處得很好，只是這些人對於本篤會要創設大學並不是完全支持。

然後，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信中，艾德豐斯似乎間接回答了總院長十月十八日信上問他有沒有和英博士及其他人接觸的問題：

然而對我而言，我們的電報透過穆先生發送，似乎是欠思量之事。容我以適度的尊敬和謙遜陳述，最初你我透過他傳送的信中，有一封被打開而且全都看過了。穆先生一位好朋友歐葛曼神父，就一再勸我不要太信任他，因為他是異教徒，很可能隨時會帶給我們問題，或是造成我們財務損失。

不過艾德豐斯對於英博士就沒有這麼強烈的批評，他反而這麼寫到：

(由於英博士)住處離北塘很近，我去開封前還前去道別。

不論艾德豐斯和當時的問題如何，艾德豐斯一九二四年的信件中兩段關於在北京建大學的話終於值得注意了。在十月八日寫給聖查威爾慈善修女學院的信中，艾德豐斯說他一直仔細研究在中國要怎樣經營一所教育機構，因為他描述了中國學生伙食該如何安排的情形：

...所有權威人士一致的意見是讓學生自己負責伙食。學院或大學的管理部門將廚房交給學生團體，由學生去聘請廚師，然後不是託付廚師作必要的採買工作，就是常見的由學生推派的委員會自行採買...不管是哪個學院或是大學，校方若是膽敢供應伙食，最後的結果就是罷課。(2)

第二段驚人的話也是出現在給修女們的信上。這段話顯示，在艾德豐斯對在中國經營大學的思考中，避免學生罷課是他格外關心的事：

前些天我去參觀天津附近一所大學，一位溫文的中國紳士、大學校長和一位美國教授帶我們參觀學校。在交談中我才聽說前面那位紳士是新到職的，因為他的前任爲了學生罷課而被革職。

總而言之，在司泰萊總院長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底北京之前，艾德豐斯正在考量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中有許多並沒有明顯的解決之道，而所有的問題在總院長抵達前他都不能去解決。比方說，如果要先設立大學，中國學生要從何而來，而中國籍的本篤會是要如何訓練？如果學院（即高中）先成立，如何達成教廷的願望？如果有中國學生有興趣入學—這件事不能保證—他期望他們有什麼樣的背景，尤其在這所學校要用英語教課的情形下？大學和修院該設在哪裡，二者應該在一起嗎？建校費用要從何而來？最後，本篤會士要如何和催生這所大學的中國天主教友合作？

艾德豐斯在一九二四年的信件對於在北京設立天主教大學最直接的價值，是讓司泰萊總院長對現況作出謹慎而周全的評估。雖然司泰萊總院長不見得總是贊同艾德豐斯的建議，但他的信卻忠實的指出如果本篤會士要在北京創立一所大學會面臨何種根本的問題。終於，艾德豐斯盡責的執行了總院長十月十八日信件中的指示：

多多傾聽，作出決定前切莫輕舉妄動。我們不可以驟下結論，使自己身受牽連。

WORKS CITED

Levaux, Leopold. *Le Pere Lebbe: Apotre de la Chine moderne (1877-1940)*.
Bruxelles and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Lutz, Jessie Gregory.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P, 1971

Oetgen, Jerome. *Mission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Saint Vincent Archabbey, The
Firs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 2000.